

学术综述

天光云影共徘徊

——吴文化研究的历史轨迹与阶段性特点

庄若江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一、前言:吴文化与吴文化研究

吴文化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地^①始终扮演着无以取代的重要文化角色。3200年前的泰伯自中原南奔吴地,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中原文化和江南土著文化有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性融合。这一融合的结果,不仅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度——句吴,也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活力和雄厚后发力量的新的文化——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文化有力地推动着吴地这艘巨轮走出了令人惊羨的千年航程。

勾吴古国在历史的舞台活跃了不到7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一瞬,然而,句吴古国虽然消失于国家版图,但作为文化形态的“吴”却没有因此消亡,吴文化不仅绵延千年,不断得到了传承发扬,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发展与变革的重要的文化素质。凭借自身的智慧灵动、开放包容的内生动力,吴文化不断吸纳着时代的鲜活元素,不断拓展着传播半径,不断积聚自身能量,在嬗变中提升,在提升中发展,从而得以在近现代有效地实现了飞跃和突破,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改革大计和一个民族前进的历史行程。

唐宋以降,吴地一直是国人心目中的天堂,这是一块由民意划出的地理区域,代表了人们的美好生活向往。今天的吴地,仍是中国的领跑区域,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经济文化联合体已经形成,经济互惠共荣,文化多元共生。历史的吴地,曾经是城门城墙簇拥的强权,曾经是密布的水网承载的繁华与安逸,现实的吴地,今天正书写着更多的精彩篇章。笔者曾在《说吴》中曾这样概括吴文化的特色:“在历史的舞台上,始终扮演着振奋精神和宽慰内心的角色——精明实惠中恪守着向上向善的道德理想,

灵动秀逸中暗孕轩昂刚健的进取精神,安逸务实自足中不乏变革纳新的要求,祥和稳定中涌动着开放吸纳的渴望……”^[1]

吴文化是一个深厚而繁复的文化系统,蕴藉深厚,内涵丰富。吴文化是重视道德取向的文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是吴文化道德高张的旗帜,谦让和谐是吴文化低调内敛的温婉旋律;吴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兼收并蓄,在开放中不断纳善,在纳善中扬弃发展,因而后来居上并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吴文化是务实进取、注重实效的文化,勤劳的吴地人民,脚踏实地,发展实业,工商强国,让经世致用的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最大的发扬;吴文化是善于审时度势、敏于把握机遇,适时顺便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吴地人总能首先发现机会,敏捷抓住机遇,不断在转型中把握发展先机,在时代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吴文化是精致优雅、从容进退的文化,从远古尚武走到今天崇文重教,吴人的追求不断精致雅化,世俗精神和诗性追求奇妙地造就了吴地美好而诗意的现世生活;吴文化是多元共生共荣的和谐文化,从苏南到浙北,因地缘关系都不同程度受到吴文化的滋养,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又赋予这些城市鲜明的品格与个性,吴文化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路径和取向,既是多元文化的折射,也使其在古雅与素朴、婉约与直白、崇文与尚武、功利与淡泊的交融之中获得了和谐之美。

在近代以来的百年进程中,吴地文化逐渐超越了古老的文明传统,成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中重要的互补元素和事实上的引领元素,影响渗透着东南沿海的大片土地,并向更广阔的半径扩展和延伸。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吴文化走向中心化、不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将吴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图谱的坐标系中,重新审视吴文化的内涵,会发现其中尚德向善、务实进取、灵动智慧、开放包

[收稿日期] 2012-09-02

[作者简介] 庄若江,女,江南大学教授,江南文化与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影视传播系主任,主要从事吴文化研究。

^①从春秋时期泰伯辟吴、周章受国,到寿梦强国、阖闾筑城,吴国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轨迹。疆域不断扩展,东至沿海,南达钱江,西至婺源,北抵宁扬,活动区域与长三角区域大部叠合。今天的吴地,主要指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其核心区域主要是苏南、上海、浙北一带吴语区,这里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

容、义利兼顾、顺应时势、刚柔相济等特质,不仅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大文化格局中也将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一个地区得以持续繁荣发展,背后必定有文化作为内在支撑。吴地之所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能够最先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理念,能够成为科技人才高地和外向型经济的集聚区,这一切都与吴文化刚柔相济、开放包容的特质有极大关系。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兼具王者大气、不断包容纳善的吴文化,正成为该区域支撑新一轮经济体崛起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如果将从古至今、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图谱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吴地文化“在许多方面,诸如张扬人性、重视工商、敬业、精致、特别是不激不扬,适意人生,在建立以人为本、积极、健康、闲适、高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方面,在现代化、后现代化建设中,值得挖掘、肯定、继承、发扬的内容很多”^[2]。只有拓展研究视野,从文化的传承的角度和不断创新的意义上去解读吴文化,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吴文化的人文传统与现代价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吴文化面对外来文化的多次冲击,表现出适时顺变的开放功能,积极吸收、融摄外来文化的先进成分,不断丰满、充实、改造自身,从而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近代以来,吴文化又积极融摄异域文化,创造出新的辉煌,表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因此,吴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吴文化最先迈开奔向近代化的步伐决不是偶然的。”^[3]

二、吴文化研究的历史轨迹与阶段特点

吴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吴文化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但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重视,对吴文化的研究是伴随着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吴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而不断深入的。从纵的历史线索看,对吴文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古典文献积淀→考古发掘→史实考据→吴地艺术搜集整理(田野调查)→实学研究→文化内涵价值(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解读等几个阶段,走出了“从外而内”、“从重实物考古到重精神内涵”、“从重物理到重社会实际”的一条鲜明的研究轨迹。

(一)从春秋到明清时期的文献积淀

从春秋到明清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吴文化积淀了大量有价值的、堪称经典的历史文献。这些古代经典文献是吴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后世学者诸多观点提出的历史依据。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两代,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积淀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尚书》、《春秋左传》、《论语》、《国语》、《战国策》、《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说苑》、《论衡》、《淮南子》等,其中以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为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程度不一地涉及到吴地、吴国的文化。《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可谓最早的一部吴国简史,富含大量珍贵信息。散见于其他各书的有关吴文化内容,也是吴文化研究

初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对吴文化早期特性的认识,如至德、诚信、利义、尚武等,都源于这些资料。如《史记》的《周本纪》、《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货殖列传》等记载了大量关于古吴国的文化信息。吴的“德治”传统,古公亶父的“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泰伯、仲雍“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的和谐让王过程,季子挂剑兑现心诺的故事,伍子胥自楚奔吴后的行径,范蠡“三迁皆有荣名”的事迹,以及后来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的孔子评价“太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均为吴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除《史记》中蕴含了丰富的吴文化史料资源外,初期研究还包括了对其他诸多文献典籍的梳理和星星点点的发掘。如《吕氏春秋》的《上德》中关于阖闾的记载,《论衡》中关于太伯“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将吴地融入“礼义之邦”的记载;《国语·楚语》中对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的赞扬等等。

强吴最终被弱越所灭,对这一震惊世人的历史大事件,诸多典籍对其原因进行了探究,这些也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重要论据。如《荀子》“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的评语;《吕氏春秋》“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所,故吴为丘墟”的分析,以及《战国策》“吴王夫差无适于天下,轻诸侯,凌齐晋,遂于杀身亡国”,《韩非子》的“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吴王诛子胥,而越勾践成霸”,《说苑》“吴王夫差好战而亡”的指陈,以及《淮南子》“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其后骄溢纵欲,拒谏喜谀,挠悍遂过,不可正喻,大臣怨怒,百姓不附”等评议,大都精辟指出吴国灭亡的教训,提出治国者应防骄奢、拒阿谀,用贤才、纳忠谏,惜民力、得民心,这些评语触及了吴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对后来的研究者有重要启示意义。可以说,这些典籍既是史实的记录,也已经有了作者对历史的基本道德判断,可以称之为最初的吴文化研究,他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学者。

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的地方志书,包括私人著作、官方编纂以及稗官野史,也为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素材。吴地素称“人文荟萃之地”,俊彦辈出,典藏丰富。自六朝以后,民风基本完成了从“尚武”到“崇文”的转变,方志笔记数量日多,不乏精品。其中不仅记述了丰富翔实的吴文化资料,也有相应的考证、分类、点评等研究。较著名的如汉代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晋代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元代王仁辅的《无锡县志》等。史学家对《越绝书》的权威性十分肯定,被视为我国地方志之鼻祖。它不仅全面记述了吴越地区地理环境、农业、气象、畜牧、水产、交通、手工业等状况,还提出了“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等具有评判价值的观点。《吴越春秋》则是一部纪传体编年史,

系统地记述了吴越争霸情况,内容多取自《越绝书》,又加以充实丰富,揉入佚闻传说,是历史演义的滥觞,正因此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文学价值。一些细节的铺陈,为后来的吴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清时期更有大量府、州、县志编纂刊印,如《苏州府志》、《常州府志》、《太仓州志》、《江阴县志》、《宜兴县志》、《昆山县志》、《无锡金匱县志》、《常熟县志》、《长洲县志》、《昆山新阳合志》等官方文本,另有诸如《泰伯梅里志》、《东林书院志》、《寒山寺志》等局部方志,都是吴文化研究的重要凭据。此外,吴地文人整理的文献著述,如徐崧、张大纯的《百城烟水》,金友理的《太湖备考》,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姚承绪的《吴趋访古录》,顾震涛的《吴门表隐》等,从不同角度层面较全面地记述了吴地的历史沿革、人物、经济、艺文、地理、古迹、风俗等,可称为一方区域的“百科全书”,这些都可归入早期吴文化研究的成果,一些记述不乏“画龙点睛”之笔,其精彩观点很受后辈研究者的重视。

(二)民国时期的吴文化调查和研究

民国时期,西风东渐,西方学术思潮和科学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界,吴文化的研究也由此步入了新的历程。如果说,古人的文献主要侧重在“记述”,民国时期则全然有了“研究”的意味。这一时期对吴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0年代蔡元培麾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对吴越文化的调查研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吴歌”的采集、整理和研究,以及费孝通对吴地农村社会文化的实地考察研究。

“吴越史地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主要基于1920年南京栖霞山张家库发掘六朝墓葬时无意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石器、印纹陶片,由此“疑到吴越在上古自有其独立之文化”。这是吴地“区域性文化”意识的初次觉醒。此后,又相继在常州淹城、上海金山戚家墩、苏州石湖、浙江平湖乍浦、杭州古荡等地发现了大批的印纹陶和石器,特别是苏州越城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史学界先贤卫聚贤、慎微之等认定这是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而打破了“江浙古无文化”的旧论。1936年2月,吴稚晖、叶玉甫、丁仲祐等在上海商谈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嗣后,南京的张乃骥、陈志良,杭州的董聿茂、陈万里分别在当地开会研讨,会员达数百人。1936年8月,“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到会代表60多人,推选蔡元培任研究会主席,卫聚贤任总干事。研究会简章明确规定“本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由此开创了对吴越文化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吴文化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从单纯的历史文献记述和研究,走向与考古调查和发掘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以新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开启了自由学术争论之先河。

研究会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物证,结合文献研究,发表了一批吴越文化的研究论文,如卫聚贤的《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太伯之封在西吴》、《吴越民族》,吕思勉的《南强篇》、《越之姓》、《与卫聚贤论吴越文化书》,何天行的《仲雍之国》,陆树楠的《吴越民族文身谈》,慎微之的《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刘之远的《石器的形成与地层之探讨》,以及日本学者苏铁的《吴越文化之探查》、松本信广的《吴越史地研究会两种报告之批评》等。陈志良、金祖同还先后出版了专著《奄城访古记》、《金山访古记》。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有力推动了吴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之间还就一些问题如对泰伯奔吴的驻足点在哪里等进行了争论,吴文化研究呈现出自由论辩之风。

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吴歌”的采集和研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吴歌是流传久远的吴地民间歌谣,早在战国时期已有“吴吟”,至南朝时形成了以《子夜歌》、《读曲歌》、《懊侬歌》、《华山畿》等为代表的《吴声歌曲》。明代以降,吴歌在城乡传播流行蔚为大观,苏州名士冯梦龙搜集辑成《山歌》就有10卷(约300首)。早在1913年,鲁迅曾率先提出加强民歌研究的观点,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他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蕴,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918年北大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在校长蔡元培支持下,研究会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收获。1919年8月,江阴学者刘复编成《江阴船歌》,苏州学者顾颉刚也在叶圣陶、潘介泉、蒋仲川、郭绍虞等支持下,搜集苏锡一带吴歌300余首,精选150首编成《吴歌甲集》(1926年出版),胡适为其作序称:“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服……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1928—1931年间,王翼之、王君弼、王煦华等搜集编辑出版了《吴歌》(6卷)。1929年李白英编撰出版了《江南民间情歌集》,1933年黄洁心编撰出版了《湖州歌谣》,另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出版的《江苏歌谣集》(5卷,其中很大部分是吴歌),由此引起了文化界广泛关注。1936年顾颉刚完成了首部吴歌研究的学术著作《吴歌小史》,对吴歌的起源、发展、特色、价值作了精辟论述。书中还收录了顾颉刚的《苏州的歌谣》、《苏州近代乐歌》,容肇祖的《说山歌的起源》,李素英的《吴歌的特质》,重九的《苏州的唱本》,胡适的《论山歌的信》,以及郑振铎、钱南扬、周作人的《山歌跋》等文,对吴歌作了多向度的探究。值得一提的是,《吴歌》(甲集)中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等人的序文,附有顾颉刚《写歌杂记》,魏建功《吴歌声韵类》、钱玄同《苏州注音字母草案》等研究文章,“用精密的方法整理出苏州方音的声韵的部类,在方言的研究上开了一个新纪元”^①。

^①此为顾颉刚对魏建功、钱玄同吴歌研究的赞语,出于《写歌杂记》一文。转引自《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王文宝《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

延至近代,吴地社会经济文化逐渐发生重大转型,吴文化研究开始呈现出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新取向。年轻学者费孝通在“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下,1936年回到家乡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并于1938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在英国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教授马林诺斯基在序中赞扬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意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该书在西方多次重印,但遗憾的是在国内直至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通过对吴地乡村典型个案的解剖,较全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苏南农村的社会情况,包括家庭结构、经济生活、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社交礼仪、民间风俗等,可视为一部广义上的近代农村吴文化研究之作。这种以家庭为基点,采用咨询估算、抽样观察、典型实例、定量分析,以及记述与考证、评论相结合等方法的灵活运用,对开启吴文化的实证科学研究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民国时期是吴文化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这些成果的取得,使吴文化研究登上了近代科学的学术文坛。

(三) 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时期的吴文化研究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吴文化研究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吴文化的研究受到社会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二是研究领域比较局限,主要体现在考古发掘和民歌民谣两个向度。1954年丹徒县烟墩山出土了“宜侯矢簋”等一批青铜器、原始青瓷器,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都参与了考证研究,由此也揭开了吴文化研究的新的—页。此后,仪征破山口、宁镇地区又出土了成批西周时期的吴文物,太湖地区发现了50余处原始文化遗址,为吴文化研究提供了先吴时期的地理概貌和文化特征。1961年10月,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和尹焕章发表了《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论文,对吴文化的缘起与特征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1952年,苏南文联曾组织大规模吴歌采风活动,收集民间歌谣、乐曲达二千多首。除了传统吴歌外,内容还涉及一些反映阶级剥削、反抗斗争等社会政治方面内容,奉贤一带的长篇叙事吴歌《白杨村山歌》就是当时代表之作。195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静人著《江苏南部歌谣简论》,是建国后第一部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吴歌研究论著。进入60年代后,受到极左思潮影响,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政治挂帅,专家受抑,吴文化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四)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吴文化研究

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随着吴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吴文化研究也呈现出空前活跃、

欣欣向荣的气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吴文化研究学术队伍的建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文化复兴全面展开。1980年9月江苏省考古学会成立,1983年5月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成立(1990年更名为省吴文化学会),此后苏南各市也陆续成立了吴文化研究会。此外,研究机构 and 高校研究平台次第建立,如江苏省社科院的吴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的吴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苏州职业大学的吴文化研究所,江南大学的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常熟理工学院的吴文化研究室等,这些平台上聚集起一批吴文化研究学者。同时,民间吴学热也逐渐兴起,1990年初无锡堰桥“吴文化公园”揭幕,该园在展示吴地民俗风情、文化特色的同时,成立了“吴学研究所”,吸纳了许多研究人员,编撰出版了《吴文化知识丛书》^①等多部吴文化读物。

其二,考古发掘研究继续深入。吴文化研究学术组织建立后,在几个向度取得了有效成果:一是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4]。如对旧石器时代的句容放牛山和金坛和尚墩的遗址发掘,厘清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文化序列。宜兴骆驼墩、西溪、江阴祁头山、溧阳神墩等遗址的发掘则对“骆驼墩文化类型”进行了确认。武进乌墩、常州新岗遗址的大型墓葬发掘,将太湖地区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提前到崧泽文化时期。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江阴高城墩、无锡邱承墩等良渚时期的贵族墓出土了玉琮、玉璧、玉钺等大量礼器,使“良渚文化”的“中国文明曙光”之说得到印证。在苏州草鞋山、昆山绰墩等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马家浜时期的水稻种植技术和炭化稻米,对探讨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具有重要价值。江宁点将台、句容城山、丹徒团山等遗址发掘,构建了宁镇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通过考古发掘,还基本确认了距今3500年的江阴余城乃商周时期江南第一古城;常州淹城遗址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城堡;常锡交界处的间江阖闾城遗址可能为春秋晚期吴王阖闾的都城。丹徒大港至谏壁一带的大型墓葬,从发掘出的随葬青铜器看可能为春秋时期的吴王陵墓。苏州大真山春秋墓、无锡鸿山战国墓等越国贵族墓的发掘,都成为吴越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

其三,实地考察调研活动频繁。实地考察调研是第一手研究资料获取的重要渠道,也是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础。1983年以来,江浙一代的各类研究学会,组织了大量的遗址考察活动,如省吴文化研究会组织的对常州淹城、无锡阖闾城遗址、吴县五峰山、借民山石室土墩墓的实地考察,镇江博物馆与华东师大采用远红外遥感摄影技术的大面积考古探查。梅村、鸿山等镇也邀请专家就“古梅里遗址”问题举办过考察研讨活动。同时,作为吴文化研究构成部分的吴地民俗研究也颇有进展,如南京博物院长期跟踪吴

^①高燮初主编《吴文化知识丛书》1994—199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1—4辑,共36本。

县胜浦进行系统民俗调查,对吴地服饰、婚丧、民居、节庆、信仰等民俗持续多年跟踪考察,完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江苏省民间文艺协会与南京大学联合进行大运河沿岸采风活动,采集民间故事 700 余篇;无锡市民间文学协会也曾组织“古运河文化考察”活动,对运河无锡段沿岸的乡镇民俗流变、民间艺人传承等作了调查研究,征集吴地民间歌谣与工艺。

随着文艺的勃兴对吴地艺术的研究也盛况空前。1985 年以来,江浙沪两省一市民间艺术工作者筹建了“吴歌学会”,对《五姑娘》、《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代表作品多次进行研讨,并邀请常熟著名民歌手、故事家陆瑞英到会表演并讲述艺术传承情况。2004 年 6 月,第 28 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先后推出《吴歌遗产集粹》、《中国吴歌论坛》、《中国白茆山歌集》(常熟)、《中国芦墟山歌集》(吴江)等一批研究成果。

其四,成果丰富,蔚为大观。1988 年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将研究会议论文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是为新时期吴文化研究最早的成果集。进入 90 年代后,吴文化研究成果日多,至 2005 年之前,主要有《江南风俗》(刘克宗、孙仪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吴派绘画研究》(周积寅著,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茅家琦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吴语概说》(颜逸明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近代江南农村》(段本洛、单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历史的回声——吴地古代妇女研究》(杨晓东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吴文化知识丛书》(36 册,高燮初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999)、《吴文化史丛》(2 册,王友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吴国王室玉器》(姚德勤、龚金元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吴越文化——中国的灵秀与江南水乡》(梁白泉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东方博物》(曹锦炎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王卫平著,人民出版社,1999)、《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勾吴史集》(张永初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王国平、唐力行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江苏地方文献丛书》(薛正兴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常州文物精华》(常州市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98)、《东方文明之韵》(徐湖平、肖梦龙、谷建祥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春秋史》(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六朝文化》(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吴国史》(戈春源、叶文宪著,人民出版社 2001)、《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吴恩培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吴歌遗产集粹》(高福民、金煦编,上海文艺出

版社,2003)、《吴中小志丛刊》(陈其弟点校,广陵书社,2004)、《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毛颖、张敏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王卫平著,群言出版社,2005)、《中国吴歌论坛》(高福民、金煦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苏州文献丛抄初编》(王稼句点校、编纂,古吴轩出版社,2005)、《吴地文化通史》(高燮初、唐茂松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吴文化概论》(吴恩培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苏州传统礼仪节令》(蔡利民、高福明编,古吴轩出版社,2006)、《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蔡丰明主编,学林出版社,2006)。此外,各城各地还有一批数目可观的当地人物传记、史实钩沉类的著述出版。

从上述成果看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内容主题比较自由分散,研究者各自为阵,因为角度立场不同而“自说自话”、“众说纷纭”;二是从研究向度看,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结合度不高,虽有部分成果比较关注社会现实,但大多研究者主要侧重历史资源的整理发掘,尚未与社会发展有实质性对接;三是对吴文化本身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古籍挖掘、考古物证、历史疑点探究等方面,对吴文化精神内涵以及吴文化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价值方面尚未有系统性、开创性成果。

(五)2006 年以来的吴文化研究

2006 年,是吴文化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其标志是“吴文化国际研讨会”的举办。2006 年 4 月,无锡市政府、中国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联合举办了首届“吴文化国际研讨会”,本来这是嵌在“吴文化节”系列活动中的子项目,但因迄今已连续举办七年,人气旺盛,专家云集,新论频出,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吴文化研讨的蓬勃展开,也促进了吴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对吴文化在大众文化层面的传播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2006—2012 年,连续七届吴文化国际研讨会共收到海内外研究论文近 900 篇,经筛选编撰,分别出版了《吴文化研究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吴文化与和谐文化》、《吴文化与工商文化》、《吴文化与创新文化》、《吴文化与现代化》、《吴文化与区域发展》、《吴文化与软实力》^①等七部厚重的论文结集。在此基础上,组委会还组织了苏锡常宁等地高校学者,耗时一年完成了近 50 万字的学术专著《吴文化纵论》^②的撰写,该著述集多年吴文化研究之大成,视野宏阔,构架科学,材料翔实,格调大气,文风严谨,摒弃偏颇,拒绝狭隘,言之有据,无论涉猎广度、还是理论深度,都超越了此前的同类著作。梳理最近七年来的吴文化研究,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1)吴文化研究呈现出系统性、规模化、常规化的态势。自 2006 年以来,一年一度的“吴文化国际研讨会”已成为国内外吴文化研究的重要平台,使吴文化研究不再是流散的、个人兴趣驱使下的学术研究,而有了一个集中发

^①后 6 册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为凤凰出版社 2007—2012 年间先后出版。

^②《吴文化纵论》,2011 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布、交流、研讨、争论的场所,学术力量、研究深度和学科影响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学者专家有了交流讨论的平台,学术研究成果也有了集中发表、出版的机会,各板块文化之间的互动也有所加强,加上江南地域的特殊吸引力,使得这一研究平台颇具凝聚力、号召力,保证了与会者层次、研讨规格的不提高。

(2)从资料发掘、考古实证走向对内涵价值的探讨,是近年吴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趋向。近年来的吴文化研究逐渐超越了狭义的吴文化框架,进入了更为深广的层面。由于文化学者的介入,吴文化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实证性研究转向对吴文化内涵、特质以及历史价值、当代价值的探究。这一取向使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互渗互动,也使拘囿学术层面的研究开始更多直面现实、服务社会。如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吴文化纵论》,就摒弃了就吴说吴的局限,而是站在大文化的层面检视吴文化,系统地对吴文化进行梳理和解读,重在挖掘揭示吴文化的思想精髓,从而激活了史实叙述、内涵挖掘与当代思考的空间对接。《纵论》只是将典籍史实作为论证依据,重在学术观点的提炼,并以吴地社会发展的成果作为吴文化历史价值的印证,并昭示出吴文化的当代意义,以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乃至未来社会历史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3)学术研究的当代意义开始彰显,学术开始向社会大众回归。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力图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考察吴文化对吴地社会发展的作用,如北京大学田庆余教授带队的运河江南段考察,江苏省社科院、科协组织的对首批苏南“亿元乡”的实地调查,以及苏沪社科院专家在吴江县进行的“江村调查”,这些调研已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吴文化研究已从资料发掘、考古实证研究为主开始转向与社会现实发生更多的联系。近年

来,吴文化平台上做的另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将吴文化学术研究推向大众文化层面。2008—2009年完成的系列电视片《说吴》,可谓吴文化研究成果在影像平台上实现跨界传播的尝试。《说吴》(别名《吴韵》)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首播后,两年中在央视各频道滚动播出30多轮次,收视率排在文化类节目第七位,赢得了很好社会反响,并获得第六届国际选片会“十大金奖纪录片”和央视“星花杯最佳撰稿奖”。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吴文化演变历程和精神特质的电视文化专题片,在主旨表现、篇章构架、艺术特色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新尝试,打破了纪录片“是一群精英做给另一群精英看的”模式套路,深入浅出,通过影像的方式将学术思考借助现代传播媒介传递给更多受众,在跨界传播中实现了文化效益的最大化,这种传播方式对当今构建文化传播路径无疑是有益的探索,被誉为“学者与影视人合作的成功案例”^[5]。

[参考文献]

- [1]庄若江.说吴[M].扬州:广陵书社,2010.153.
[2]熊月之,马学强,胡敏.吴地文化的人文传统与现代价值[A].周向群.吴文化与现代论坛[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07.
[3]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63.
[4]张敏.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与新理念[J].东南文化,2009,(1).
[5]高峰.文化学者与影视人的成功合作[A].庄若江.说吴·序2[M].扬州:广陵书社,2010.5.

(责任编辑:张杰)

(上接第112页)

- [12]于孔宝.姜太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谋略[J].河北学刊,1995,(1).
[13]孙家红.试论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兼与周公相比较[J].中国文化研究,2011,(夏之卷).
[14]徐树梓.姜太公经济管理思想特点浅说[J].管子学刊,1994(4).
[15]刘宝河.姜尚的人才观[J].天山学刊,1994,(2).
[16]刘春志.论姜太公军事思想对后世兵学的影响[J].管子学刊,1995,(3).
[17]徐树梓.姜太公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浅说[J].管子学刊,1996,(3).
[18]徐宇之,宣兆琦.论姜太公治齐及其对齐文化的影响[J].历史教学,1992,(1).
[19]赵蕴.姜太公神话探析[A].姜太公新论[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 [20]全晰纲.宗教行为与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J].辽宁大学学报,1999,(5).
[21]刘庆.姜太公与中国古代战神崇拜[A].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C].济南:齐鲁书社1997.
[22]朱海滨.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从姜子牙到关羽[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2011,(1).
[23]张玉春.《六韬》探源[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6).
[24]吴显庆.《六韬》成书年代及作者新论[J].学习与探索,1996,(1).
[25]邵鸿.《六韬》二题[J].求是学刊,1998,(3).
[26]王联斌.《六韬》的军事伦理思想[J].军事历史研究,1994,(4).
[27]代生.也谈云梦睡虎地秦简《魏律》——从有关姜太公的经历说起[J].史林,2009,(4).

(责任编辑:张杰)